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1.008

艾丽丝·门罗成长小说中的心智残疾书写

唐莹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心智残疾在艾丽丝·门罗的成长主题作品中实现了残疾主题的内在意义与象征功能两者的紧密结合。在门罗的笔下,少女主人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残疾和死亡等与“成长”相悖的客观事实,而这些也表征着主人公成长道路上的风险和难关。随着门罗创作风格的发展成熟,她的残疾书写呈现出女性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危机、理解危机,最后克服危机的演进。门罗对心智残疾的描摹和探究突破了传统文学中的隐喻功能,体现出深刻的生命哲学思考和对当代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

关键词:艾丽丝·门罗;残疾叙事;成长小说

中图分类号:I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1-0057-05

加拿大短篇小说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31—)被誉为当代契诃夫,凭借无与伦比的写作技巧和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蜚声世界。学界对于其作品和风格的探究大都集中在女性主义、加拿大国民性和叙事技巧等方面。研究认为门罗以高超的技巧、细腻的笔触和清醒的态度描摹现代女性日常生活,展示人类普遍伦理困境。“门罗的小说体现了她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个体寻求自我人格独立完整过程中难以左右的力量的剖析,对人类普遍心理诉求与复杂人性的探索,具有打动人心。”^①她的故事经常从处于青春期的少女视角透视生活,叙事者“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②,以此揭示女性个人意识的萌发与成熟过程。残疾,特别是心智残疾是门罗关注少女成长的作品中的常见意象,多篇故事中都出现了与女主人公年龄相仿的智力残疾者。自启蒙时期以来,成长小说经历了主题上的转变,包括情感、

欲望在内的身体由被理性克服、压制的对象而逐渐复苏,“直逼权力话语、外部秩序、普遍真理对个体生命的制约”^③。女性成长小说更加强调身为“他者”的女性主人公会遭遇到的性别相关的困境,突出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危机、理解危机、最后克服危机的演进变化。通过对心智残疾的书写,门罗在写实与隐喻两个层面揭示出女主人公成长过程中面对的风险和挑战,表现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伦理关怀。

残疾主题在文学表现中担负着看似彼此割裂的两大功能:象征与写实。传统文学中的残疾叙事主要体现隐喻意义:残疾超越肉体层面,被视为一种耻辱(stigma),与人物自身道德品行的欠缺直接相关。隐喻的运用根源于宗教在疾病、残缺与不虔信之间建立的因果联系。米切尔和斯奈德(Mitchell and Snyder)提出了“叙事义肢”(narrative prosthesis)的概念,揭示出残疾话语在文本中的隐喻功能和伦理价值,“历史上残疾被当作拐杖,文学叙事倚靠

收稿日期:2023-08-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WW068);大连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项目(2022XJYB05)

作者简介:唐莹(1978—),女,辽宁大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小说研究。

①黄芙蓉:《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婚姻暴力与女性成长意识》,《当代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

②Boggards W M. “Probable Fictions: Alice Munro’s Narrative Acts ed. by Louis K. MacKendrick, and: *The Art of Alice Munro: Saying the Unsayable* ed. by Judith Miller (review)”, *ESC: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1987, 13(1): 115-119.

③马新亚:《成长书写背后的个体辩证法——重读〈在细雨中呼喊〉》,《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

其上,谋求其表征力量、破坏潜能和分析的远见”^①。当代残疾研究将在文学中作为叙事手段和超验象征的残疾意象实化为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的折射,符合“语言构建现实”的后结构主义思路,与种族研究、性别研究等共同致力于将“差异”作为语言所定义的现实而将其虚无化。“现代社会对残疾的理解绝不仅仅局限于生理层面,而把它当作是社会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结果”^②。门罗成长故事中的残疾书写实虚兼备,既客观承认现实生活中多样性的存在,解构由“正常人”主导的世界,也继承传统文学中以“叙事义肢”所代表的,目指隐喻功能的残疾叙事。从以出版年代为顺序对以下3则短篇小说中心智残疾书写的梳理可以看出,作者在抵抗残疾的泛隐喻化倾向的同时,采用写实与象征二者兼具的表达策略。随着创作思想的成熟,门罗在成长故事中不断拉近叙事者与残疾的距离,与此同时,又将其进一步意象化,标志着少女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萌发成熟和为身份认同而进行的决绝的抗争。

一 《幸福幽灵之舞》的“异世界”

门罗的首部短篇故事集《幸福幽灵之舞》(*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1968)中的同名故事讲述了少女随母亲参加钢琴老师的演奏会时,遇到了一群来自特殊学校的智力残疾儿童的经历。钢琴老师马萨利斯小姐教出了镇上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她每年自费举办演奏会,家长和学生却很不情愿捧场。尽管钢琴老师对待学生和音乐的热情依旧,为了聚会精心准备饮食和礼物,所有的客人却都在心里盼望着演奏尽早结束。主人公自己是到场孩子中年龄最大的而恼火,母亲因为朋友爽约而不快,与其他客人放肆地品评聚会上的食物。这时一群来自残疾人学校的孩子出现在门口,他们作为马萨利斯小姐的学生受邀出席。其

他人心中十分不快,“没有人告诉我,我来这里是为了听一群小……小白痴,他们本来就是白痴……这是什么聚会?”^③奎森(Ato Quayson)用“审美不安”(aesthetic nervousness)来形容健全人遭遇残疾人时的心理感受,在文学讨论中表现为“在与残疾相关时,文本中的主导代表规范所遭遇的短路现象”^④。震惊无措之余,宾客们表现出虚伪的礼貌。

演奏会的最后,一位与主人公年纪相仿的智障女孩以一首《幸福幽灵之舞》技惊四座。客人们在惊讶之余反而心生不悦,仿佛被愚弄了一般。“弹完的那个瞬间,显而易见,她和刚才没什么不同,只是格林希尔学校的女学生而已……女孩的才艺不可否认,但终归一点用也没有。”^⑤观众热烈地讨论起这首动听的乐曲,对残疾演奏者却不着只言片语。与麻木而虚伪的大多数人不同,主人公在回家的路上反思这一事件,马萨利斯小姐邀请智障学生参加演奏会的行为意味着她自绝于小镇社群,再不会有什么演奏会了,但是为什么大家无法再“可怜”马萨利斯小姐呢?也许正因为那首乐曲代表了“她生活的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公告”^⑥。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善于自省,她逐渐认识到包括母亲在内的小镇居民的虚伪本质与中产阶级生活的空虚无聊。他们会为残疾孩子的演奏喝彩,在心中却无法将他们引为同类。他们对健康、经济状况处在下降期的马萨利斯小姐表现出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残障人士在演奏会上的出现和残疾少女卓越的钢琴演奏击碎了这种优势,人们觉得受到愚弄、侮辱、甚至威胁。

白鲁贝(Michael Bérubé)认为,残疾存在一种层级,“比起身体残疾,智力残疾更容易、也更广泛地被用作非人化的手段”^⑦。在门罗笔下,智力残疾的人物表现出的不是内在的机能失调,而是

① Mitchell D T, Snyder S L. *Narrative Prosthesis: Disability and the Dependencies of Discours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p. 49.

② 陈彦旭:《隐喻、性别与种族——残疾文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6期。

③ 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④ Quayson A. “Aesthetic Nervousness”,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 ed. Lennard J. Davi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219-231.

⑤ 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页。

⑥ 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页。

⑦ Bérubé M. *The Secret Life of Stories: From Don Quixote to Harry Potter, How Understanding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ransforms the Way We Read*.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7.

没有达到“社会正常”标准的操演。对于非残疾人士来说,心智问题比身体残缺更深刻地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资格。演奏会上残障儿童们这种作为人的失格在小镇居民面前的展演使他们无法忽略自己遭遇相同境地的可能性,与残疾相关联的“耻辱”也加诸非残疾人士身上。而演奏选曲与死亡的关联更加凸显出危险在成长道路上无所不在的现实。《幸福幽灵之舞》选自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歌剧《奥菲欧与尤丽狄茜》(*Orfeo ed Euridice*, 1762),取材自俄耳甫斯在地狱中寻回自己新娘的爱情故事。在希腊神话中,白银时代的人们在百年之后化为幸福幽灵,在冥界过着快乐的生活,在俄耳甫斯优美的音乐中翩然起舞。这样的一首乐曲使聚会上的人们感受到音乐带来的片刻的超越,也使主人公认识到马萨利斯小姐和残疾的钢琴学生代表了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另一个世界”。福柯笔下 15 世纪的愚人船载着被放逐的疯人远离人类社会,漂泊于茫茫海上,而现代文明伪装下的小镇共同体无法将残疾摒绝于生活之外。《幸福幽灵之舞》影射了失能与死亡的永恒威胁,和这样的悲凉前景下人类生存的虚无本质。

二 《特权》中生命限度的表征

《幸福幽灵之舞》中少女主人公对于“异世界”的惊鸿一瞥给予她对于生活本质的顿悟,其中的智力残疾兼具与一般人生的对照作用和普遍象征意义,门罗之后的创作更集中于讨论残疾与性别的叠加效用。在出自《你以为你是谁?》(*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1978)的《特权》(*Privilege*)中,少女主人公露丝的学校里有一个智力残疾的女孩弗兰妮·麦吉尔,她长相丑陋怪异,长期遭受其他孩子的欺辱。没有人敢对弗兰妮表示出善意,因为她会紧跟着任何不打骂她的孩子,“见到她马上躲开是必要的,她看到你眼睛的时候,你要露出警告的怒容”^①。与上则故事中有学校培育、家庭照拂的智障少女不同,弗兰妮代表了少女成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最坏境地,父亲对她拳脚相

加,哥哥当众强奸她,教师冷漠无能,最后她沦为性暴力的牺牲品,一个“白痴而无害的妓女形象”^②。对于敏感多思的露丝来说,弗兰妮不仅代表了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受的与性相关的暴力伤害,也象征了无所不在的死亡威胁,身为血肉之躯、凡夫俗子的限度。成长意味着学会躲避弗兰妮,避开各种阴暗危险的可疑之处,甚至避免说出生活的真相。

一方面,主人公露丝尽力避免想象弗兰妮无比恶劣的遭遇。她对弗兰妮缺少同情,后者的悲剧甚至成为她日后用以打动他人的谈资。但在另一方面,露丝对弗兰妮也无法抱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道德优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露丝从父亲对自己的体罚中^③也感受到了类似的肉体的脆弱和示众的屈辱,甚至是对死亡的惧怕。这种对肉体威胁的抽象化恐惧也是成长成熟过程中个体必须接受的生存现实和需要努力克服的难关。在少女主人公身上同情或是怜悯的缺席是一种深刻的伦理控诉。这不局限在呼唤读者对冷漠的主人公进行道德指摘,也体现出不幸在人生中的无所不在,特别是女性遭受此种偶然灾祸的可能和肉体终将死灭的必然。

在成长危机的阴影下,学校里鸟儿的照片是露丝唯一的安慰,“它们代表的不是鸟儿本身,不是蓝天和白雪,而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有坚守的纯洁,有充裕的信息,有它独特的无忧无虑”^④。打造这样一个“天高任鸟飞”的理想世界成为少女试图理解消化和身体、生命有关的困境的对策。女孩之间热衷于玩葬礼的游戏:扮演死者的女孩躺卧于鲜花之中,其他人围住致意哭泣。在这一堪称离奇的场景中,“女性像孔雀或雄性天堂鸟般艳丽,却成了为逝去生命所萦绕的死亡女神”^⑤。通过一次次的彩排,死亡被美化,被浪漫化,变得可以理解,进而可以接受。在想象自身肉体消灭、灵魂升华的过程中,死的冷酷本质逐渐消亡。门罗并没有赋予露丝一般意义上的对于弱者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而是揭示出女孩怎样以自己

①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邓若虚译,译林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9 页。

②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邓若虚译,译林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9 页。

③出自同本故事集中的《庄严的鞭打》详细地描述了露丝遭受父亲体罚的心路历程。

④艾丽丝·门罗:《你以为你是谁?》,邓若虚译,译林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4 页。

⑤姚成贺:《自然语境下拜厄特〈孩子们的〉书中的艺术“制造”书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5 期。

的方式去消化肉体的脆弱、生命的限度以及被注视所带来的羞耻感。与前作相较,作者在相似主题的表现上体现出主人公更大的主动性和对女性宿命的反抗精神。

三 《孩子的游戏》中对危机的决然反抗

随着门罗的创作愈加丰富和成熟,与成长如影随形的残缺与死亡这一存在主义主题在其成长故事中表现得更加尖锐,不可调和,主人公的反抗也更加激烈、决绝。出自《幸福过了头》(*Too Much Happiness*, 2009)的《孩子的游戏》(*Child's Play*)中的主人公马琳在童年时与有智力缺陷的女孩维尔娜为邻。尽管维尔娜从未做出任何切实伤害马琳的举动,对她只有善意和巴结,马琳却一直深受其困扰,对维尔娜不断的亲近行为深恶痛绝。与维尔娜为伍带来马琳自我意识的降格,有人会因她们住在一栋房子里而将她们误认为姐妹,这让马琳十分惊骇。与社会普遍因残疾人的奇特容貌而投的注视相反,马琳无比厌恶维尔娜对自己的关注。“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能在一个地方待那么长时间,而且眼睛只盯着一样东西。常常盯的是我。”^①福柯意义下的注视表征了一种权力层级关系,而成为维尔娜注视的对象使马琳经历了身份的降级。甚至维尔娜的形象对马琳也构成了一种威胁,“她瘦得皮包骨头,骨架子那么小,脑袋也那么小,让我想起蛇头来”^②。蛇是恶的经典文化象征,而将智力残缺的维尔娜比喻成蛇代表的不是残疾人群自身作恶的可能,而是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时刻警惕的、来自他人的伤害,尤其是两性关系上受害的风险。“她确实不会对我有什么实际的伤害,不过,她能扰乱你的五脏六腑,让你痛恨自己的生活。”^③拒绝维尔娜的接触和友情意味着青春期的马琳在逃避面对生命中可能会遭遇的灾祸和危险,但更重要的是,她在回避身为肉体凡胎所注定的平庸与不堪。

在马琳终于搬家摆脱了维尔娜的“纠缠”后,却在夏令营里发现维尔娜所在的特殊学校也受邀来到营地参与活动。此时马琳正过着惬意的生

活,在夏令营结识的朋友沙琳出身优越,活泼开朗,马琳为沙琳能主动向伸出友谊的橄榄枝而受宠若惊,同时也在极力隐藏着自己的平庸背景所带来的自卑情绪。在马琳自我认同的关键时刻,维尔娜的出现使她再次直面身份危机,不断增长的恐慌使马琳采取了极端措施。在夏令营的最后一天,她与沙琳在游泳时一起溺死了维尔娜。维尔娜的死被认定为意外,没有引起任何怀疑。马琳与沙琳渐行渐远,几十年后,沙琳身患绝症,在即将离世之时表现出了痛悔,而马琳一直毫无忏悔之意。这种负罪感的缺失指向马琳身上心智理性的缺陷。她一生追求自身存在价值、抗拒女性传统角色的选择表明“消灭”维尔娜的存在对她来说是为主体身份抗争的必要一步,但是在追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对他人的冷漠和伤害又何尝不说明马琳自身存在着隐性的精神疾病?

本则故事颇具伦理争议,人物的死亡场景一再被非人化处理,维尔娜被两人按在水下时“轻盈得如同水母”^④;马琳去探望临终的沙琳时,注意到的只是她“仿佛放大的肝脏……小鸡似的脖子”^⑤的不堪形象。门罗的女性叙事者对于残疾人物以及死亡的冷漠甚至厌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普遍对自身智能、精神状态、心理安全和社会身份的不确信。这种不确信的危机在根源上是由社会规范强加给女性群体的,作品内部同情的缺席对读者提出伦理要求,既关注残疾问题自身也重视身体和性别偏见引起的社会公义缺失。

四 心智残疾在成长小说中的伦理内涵

门罗的女性成长故事将向上的成长成熟与向下的残疾和死亡进行了并置,叙事者/主人公对智力残疾人物缺乏移情,作者将残疾及死亡奇观化,以此反映出残疾人物所遭受的耻辱,更影射了女性的普遍困境。以上3篇故事中共有的心智残疾和死亡元素模糊了“残疾”与“正常”的界限,“生”与“死”的区隔,意味着门罗笔下的少女意识到自己濒临相同险地的可能,并通过对残疾者的

①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页。

②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页。

③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④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

⑤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

回避,甚至“移除”来避免或消灭这种危机,标志着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对自身弱点的否弃,但更暴露出年龄与性别带来的不利现实。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解释列维纳斯的“面容”概念时,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是我对他者所处危险境地的忧虑使我想杀掉他者吗?是他者的软弱可欺成为我谋杀他的诱因吗?”^①他者的险境表征的是人生的普遍现实,对个人有限生命的恐惧;拒斥、消灭软弱的他者也就意味着化解自身遭受灾祸和死亡的风险。门罗的少女主人公们通过强化残疾他者的痛苦来对照自身的自洽存在,但是她们内在的相似性却使这一目的无法实现。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意愿与难以左右的命运这一矛盾呈现也将门罗的伦理质询带向了更加普遍、更加深刻的层面。

残疾研究的主要理论建基于后结构主义对语言所架构的现实、身份的消解。因此,残疾研究经

常与性别研究、种族研究等叠加起来形成更加复杂,但从根本上说是同质性的议题。奎森提出“伦理核心”(ethical core)的概念来框定残疾书写的伦理功能,“残疾使美学领域回归到积极的伦理核心,最终打破表征的表面”^②。门罗通过身怀理想抱负的少女与心智残疾者的互动将对有限肉身的不适感升华为成长过程中的险恶阻碍与肉体湮灭的恒久威胁。从她的首部故事集到 21 世纪的作品,在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心智残疾意象在成长故事中对少女主人公构成了越来越无法忽略的存在,在她们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引发“顿悟”、转变、甚至反抗意识的关键角色。门罗并非在强调“不正常”或是“残缺”的遗憾,而是揭示出维护女性完整身份与争取有意义生存的难度。

Writing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n Alice Munro's Coming-of-Age Stories

TANG Yi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The motif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n Alice Munro's coming-of-age stories features both in the literal expression and in the symbolic sense of disability. In Munro's writing, the girl narrator lives in a world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death, factors contradictory to "growth" and at the same time, threatening and hindering her achieving full adulthood. As Munro's style matures, she renders the disability motif in a way that mirrors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evolution in encountering, comprehending, and overcoming crises. Munro's approach towards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and gives voice to the author'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concern for women's exist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 Alice Munro; disability narrative; coming-of-age stories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Butler J. *Pre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4, p. 135.

^②Quayson A. "Aesthetic Nervousness",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 ed. Lennard J. Davi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219-231.